

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

——《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刘玉芳, 历彦军

(南华大学 期刊社,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擘,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重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城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关键词: 《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10.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6-0081-05

The Mirror Revealing the Beauty and ugly of National Character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Biancheng Town”

LIU Yu-fang, LI Yan-jun

(Periodicals Department, Nanhua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literature giants of 1920s and 1930s, Luxun and Shen chongwen's writing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re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Luxun focused on revealing the ugly, pushed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didacticism,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 to the peak and portrayed the classic image of Ah Q with the symbol of spiritual victory and slavery consciousness. While in *Biancheng Town*, Shen chongwen praised the sacredness of life, focused on revealing the beauty and paid attention to exploring and showing the traditional virtue and natural humanity of villagers with love and beauty as his eternal life subject. Both novels embodied their similar ideal for analyzing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forming national classics. The paper compar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fferent show of the ugly and beauty of humanity, social environment, the different show of the ugly and the harmonious beauty of nature, folkways, the show of national character with differen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Biancheng Town; national character; compare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王纲解体、新潮涌动的大变革时代。处于战乱频仍、政治急剧动荡,权力更迭异常频繁的生存大环境,面对着冷漠、愚昧而又麻木的大众,是像鲁迅一般用“呐喊”来努力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着的同胞,还是如沈从文一样期盼着人们继续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20年代的鲁迅塑造了一个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轻自贱、奴隶意识十足的病态扭曲的灵魂,从而使阿Q的一生成为国人的 人生,阿Q性格也成为现代国人的魂灵;在30年代

沈从文的笔下,不仅有集自然美、人性美与人情美于一身的爱与美的化身的翠翠,更有着体现中华民族以诚待人、重义轻利、古道热肠传统美德的摆渡老人、船总顺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自然与人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寄托了作者重造民族精神的理想。这样,《边城》“示美”以激起人们对人性美的渴望与追求,与《阿Q正传》“揭丑”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中体现出两代作家解剖国民性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

一、阿Q与翠翠:人性丑与美的不同展演

《阿Q正传》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沈从文通过《边城》旨在“为人

收稿日期: 2009-10-14

作者简介: 刘玉芳(1976—),女,湖南双峰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在阿Q的身上，几乎融会了中华民族病态国民性的全部要素；在翠翠的身上则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爱与美的最高理想。

阿Q，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只给人家做短工，平日只要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阿Q不仅在生活上十分满足和得意，在精神上，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阿Q身上最明显的国民劣根性便是精神胜利法和奴隶根性。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多个角度反复地进行了渲染。例如，写别人打了他又不许他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慰，他就干脆作践自己，说：“打虫豸，好不好？”不过他也并不为此而懊丧。他有自己别开生面的思路：他觉得自己可算得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2]⁴⁹²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赵太爷打了阿Q一个巴掌，认为他不配姓赵，从此他就不敢说姓赵了，对假洋鬼子打在他头上的哭丧棒，除了“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别无他法，而且挨了一顿打，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了，奴隶意识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那么，什么是造成阿Q们奴隶意识的根源呢？是等级观念和等级心态。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欺负弱者似乎也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3]

鲁迅在阿Q们身上更触目惊心的发现是他们的所谓“革命”。千百年的历史证明，阿Q们的革命不是什么绝望后的反抗，却是被逼无奈下“彼可取而代之”的传统野心。作者深入阿Q的潜意识，描述了阿Q的革命梦幻和内心独白，沉重地揭示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中最深处隐藏着的也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皇帝梦。阿Q是可笑的，是可卑的，更是可怜的。他的“丑”活脱脱地现出了被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挤压扭曲变形的国人的灵魂，为国人的自我反省提供了一面宝贵的“丑”的镜子。

沈从文通过《边城》旨在“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因此，在女主人公翠翠的身上

寄托着作者对人性爱与美的最高理想，也寄予了另一种生命形式：“它内涵着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着自己的本份，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污染，……它有主心骨，坚定地把住命运的航舵。”^[4]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翠翠壮健的躯体，碧溪的竹篁、白塔给了她一颗决不世故的赤心。翠翠天真而善良，淳朴而活泼，处处体现着自然的活力与印记。自然赋予翠翠人性美，而这种人性美又反作用于自然，使整个大自然都被人格化了，边城的一草一木也因此融入了人的气息。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巧妙地将自然美与人性美聚合在一起，将他对大自然的爱、对故乡的爱、对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古朴人性的爱都承载到了翠翠身上。

翠翠是善良的，这不仅仅在于她对自然的友善，对物事的亲和。翠翠对老船夫的爱淳朴、自然、真切，并且贯穿小说的始末。这种爱绝非单纯的“孝顺”。翠翠打懂事起，就一直为祖父分担着渡船的任务，甚至抢在前头不让祖父起身，无人过渡时，翠翠便同祖父用小竹作成竖笛，一吹一唱，快乐的空气便在山溪两边回荡着。翠翠是自然之子，她日渐长成的身体，少女初开的情窦，期待又含羞怯的情怀，都像拔节的翠竹一样，合乎自然节律地萌动、滋生、长养。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两山的篁竹翠色逼人，青山与绿水滋养了翠翠的灵性，自然与人融合，这不正是作者渴望复归的自然的人生形式吗？

翠翠又是淳朴、纯洁而又坚贞的，这主要是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拥在自然怀抱中的翠翠在自然的浸润下慢慢地生长、成熟着，她对爱情的认识也一点一点地萌芽、发展、成熟。从小时的翠翠爱看新娘子的花轿，到翠翠因天黑等爷爷而路遇正在捉鸭子的傩送那种朦胧的爱种子逐渐地埋在了她的心里，她那少女的纯情便有了期盼。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时，翠翠梦中的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5]⁸⁹，梦里和现实中摘虎耳草便成了她爱的寄托。后因明白一系列误解产生的原因时，翠翠也更坚定了对傩送的爱恋。尽管“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5]¹²²翠翠明天的命运怎样谁也不知道，但她仍然等着。一颗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少女的心，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永远跳动。

翠翠的“美”，不仅是茶峒古朴民风的延续和发展，更是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义完美结合。她与雉送的爱情虽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和遵从古礼的醇厚人性。一切都那么自然，而在自然之中却显示了淳朴人性的永久魅力。我们从翠翠身上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人性美，这不仅是一种发自人性底色的“爱”之美，而且有着一种人人相爱、人人互重的“善”之美。翠翠纯真、可爱，她是“美”的。而这种美，正是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美好人性的范式，一面宝贵的国人自我借鉴与提高的人性爱与美的镜子。

二、社会环境：群丑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展演

未庄和茶峒是人物活动的社会舞台，人性的丑与美仍在继续上演。无论在未庄还是在城里，阿Q都不是唯一的“愚弱的国民”，与他精神状态相仿佛的国人，不仅处处有，而且人数众多，他们是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基础；而在边城，摆渡老人重义轻利、古道柔肠，船总顺顺豪爽慷慨，杨马兵宽厚善良，这些共同构成了人性美的画卷。

未庄无聊的闲人们对待社会最底层的阿Q极尽嘲笑之能事，他们不断地拿阿Q的癞疮疤开玩笑、恶作剧，不断地变换方法愚弄阿Q。在阿Q忍受不了嘲笑而骂或要打的时候，这些人就捏住阿Q的辫根，在墙上碰响头，还非要阿Q承认这是“人打畜牲”不可，以污辱他的人格为乐；在阿Q与小D“龙虎斗”的时候，他们就在一旁叫好；在阿Q欺负小尼姑的时候，这些人就在一旁“九分得意的笑”；自然，在阿Q被拉去游街、枪毙的时候，又是这些人“张着嘴”，“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未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冷漠、无聊，没有些许温暖、同情与爱的世界。在茶峒，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则是那么自然和谐地相处着。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5]19}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和谐，洋溢着一派勃勃的生机。

未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等级观念浸染毒害下的势利。处于统治地位的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阿Q的耳光那当然就是阿Q的错，“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当阿Q穿着“新夹袄”，腰间“挂着一个大搭连”，“满

把是银的和铜的”时候，人们对他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尊敬。“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2]509}不仅一般的未庄人这样善变，就连赵太爷也是如此。这就是势利的未庄。边城社会也有贫有富，却并不因贫富而分等级。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虽有八只船，却是个“大方洒脱的人”，“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5]24}钱财没有改变人的本色。船总的两个儿子同父亲一样有着边城人的淳朴和善良，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无一不精，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即使他们在面对爱情的竞争时，也没有失去追求平等这种本性，更为感人的是老船夫的朋友杨马兵本是翠翠母亲的追求者，在老船夫死后却担负起照顾这个“孤雏”的任务，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边城人少功利心，少势利，一切都那么淳朴自然，体现着人性的美好。

未庄人又是吝啬与贪婪的，其中以赵太爷最为典型。他晚上不许家人点灯，可见吝啬之一斑。惩罚阿Q的条款中，有这样一条：“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2]503}这与阿Q向吴妈求爱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说工钱没有理由不付，就说那件破布衫也是没有不准取还的理由的，更何况对于家财殷富的赵太爷来说，取之何益？贪婪到连一件破布衫也不放过，实在出格得令人难以置信。赵太爷尽管曾经这样不择手段地压榨阿Q，但阿Q中兴归来，在贪便宜的欲念的驱使下，他却又不顾身份向阿Q求购价廉物美的赃物。为了迎接阿Q的到来，这晚上还“姑且特准点油灯”。与之相对应，《边城》中的老船夫，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五十年如一日，认真地恪守着一个摆渡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却从不抱怨什么，也不想求什么，一切出于自然本性。老船夫生活十分清贫，每顿只吃“闷瓜菜”，表现出来的仍是重义轻利、助人为善的品格。老人的热诚和负责精神受到过渡客人的由衷感激，由于“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之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5]12}他贫穷，却不因此失去善良的本性。在小小的边城，人

们的以诚相待总是相互的,水手、商人送他红枣、粽子,这时他知道多少总得领点情;但另一时又非常固执,决不占别人的半点便宜,“他想买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5]54}这不是几个铜钱的问题,关键是这种边城人的性情、行为本身就表现了茶峒子民之间的互敬互爱,相互理解与尊重。老船夫对待钱财的态度也体现了沈从文对普通人性的理想:淳朴、善良、优美而又自然。

三、民风习俗:不同民族特色的国民性展演

鲁迅的小说,描绘的大多是一些具有浓郁儒家文化色彩的民风习俗:森严的封建等级,传统的封建礼仪,古老的迷信习俗,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些都浸透于鲁迅笔下所描绘的诸多浙东民俗中,具有一种古朴凝重的审美风格。茶馆酒店,赛神社戏,这些场景展示了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从而更为生动地表达了他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创作主旨。鲁迅常以十分俭省的写意笔法将对浙东乡镇习俗的描写非常自然地楔入作品叙写中,或构成乡土气息浓郁的故事背景,或成为意蕴深刻的情节主干,或形成发人深省的小说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冷漠的乡土社会和乡民们麻木愚昧的心态^[6]。

阿Q生活在未庄,那里有土谷祠、水田、酒店、赛会、赌摊等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风俗;此外,还有大竹杠、破毡帽、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乌蓬船等。通过这些习俗,使我们感到阿Q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人。鲁迅将以上的民俗细节作为作品的情节来展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押牌宝的场景、用香烛赔罪的风习、游街示众的情景的描写,都使《阿Q正传》更为生动真切,洋溢着具有浙东民俗色彩的乡土气息。具有吴越文化传统的绍兴乡镇流传着诸多具有地方色彩的乡风民俗,鲁迅在其小说中细致地描绘故乡民俗,他曾请家中的工友讲述《龙虎斗》中“手执钢鞭将你打”是怎样唱的,还问如何押牌宝,这些后来都用在《阿Q正传》中。

在《边城》中作者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摒弃了湘西民俗中野蛮、落后等粗犷的因子,把自己的情感与理想寄托在美好的民俗活动中。茶峒是边城,边城有边城的风俗。端午、中秋和过年是边地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作者尤其对端午节做了详尽的描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

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5]27-28}紧接着作家极尽其详地描写了龙舟竞赛、军民同乐的场面。龙舟在锣鼓声的助威和桨手们的奋力划击中,随着急促的节拍破水向前,作犹如“梁红玉老鹳河水战”般的竞渡。而赛后军民下河抓鸭子的习俗,更给这欢快热烈的场面增添了几多谐趣。粽子、糍粑、渡船、吊脚楼、小背篓、对歌、赛龙舟等都是湘西特有的风俗,作家抓住了最具代表性的端午节,把边地古朴、实在的风土人情不加雕凿、条缕分明地道来,令人可信可亲。在这样的节日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特定的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湘西美好的人生形式,湘西人民健康、充实的心灵,通过端午节这一优美的载体,全部展现了出来。

《边城》里写了不少婚俗,提亲、陪嫁、迎亲等,更重要的是形象地指出两种不同的成婚之路——车路和马路。它们其实就是苗族和汉族文化生活差异性的表现。车路与汉族婚俗一致,马路与苗族婚俗一致。前者具有堂皇而名正言顺的特点,婚姻的缔结是双方长辈的权力和义务,而婚姻的当事人无足轻重。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胜过情感,婚姻和爱情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天保选择的就走车路,他把事情的成败完全交给老船夫来决定,好像与翠翠一点关系也没有。傩送和翠翠在性情气质上都和谐一致,他走的是马路,那是一条爱情胜过婚姻,情感重于义务的成婚之路,靠自己的歌声把两颗心唱到一起。他得到了翠翠的爱情。在苗族生活中,青年男女不会唱歌便找不到爱人,美丽的歌声比一切都重要,它可以飞越贫富不均筑成的高墙。做长辈的较尊重儿女的意见,对于嫁娶对象,不太注重身份、钱财,更注重爱情的价值。当碾坊和渡船摆在面前,傩送始终把选择放在渡船一边。湘西民族充满情和爱的婚俗是美好的,翠翠们的爱情尤显得纯真可贵。

四、结语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文学大师,鲁迅与沈从文用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国民性。在对待国民性这一问题上,鲁迅是通过《阿Q正传》对国民奴隶性的解剖,对人性“恶”的揭露,在审美上,把读者

带入了现实的“真”；《边城》中，沈从文则通过对翠翠、老船夫等健康人性的展示，对人性“善”的颂扬，把读者带入了理想的“美”。阿Q的性格是“几千年封建的儒教的环境所造成的‘中国民族性的提要’”，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7]；阿Q的性格是兼具主人与奴才之双重对立人格于一身的心理劣根性。所以，鲁迅就希望通过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示，进而使国人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边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化了的湘西，一个作者心向往之的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尽管在温暖、柔情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但他毕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宁静自足的理想世界，也是一个在现实中失落了的世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现出沈从文的思想倾向，即以爱与美的理想为镜，照出旧时代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严酷现实，从而提出以人性的爱与美改造社会、重塑人性的理想。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
- [2] 鲁迅. 呐喊·阿Q正传[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3] 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40.
- [4]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231.
- [5] 沈从文. 边城[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6] 杨剑龙. 论鲁迅乡土小说的民俗色彩[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6): 52-58.
- [7] 茅盾. 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N]. 申报·每周增刊, 1936-05-30.

责任编辑: 曾凡盛

(上接第77页)

时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他提出的译名著论, 白话翻译论, 直译论等翻译选择观既受制于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权力话语, 也与他个人的诗学观有一定的联系。可见,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20]。胡适的翻译观折射出中西文化两种权力话语的交锋。

参考文献:

- [1]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 李红绿, 赵娟. 胡适翻译思想探析[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2): 68-72.
- [3]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4] 朱立元, 张德兴. 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吴友富. 外语与文化研究(第六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515
- [6] 郝吉环. 权力话语与翻译理论与实践[J]. 语言与翻译, 2004(2): 14.
- [7]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8] 范祥涛, 刘全福. 论翻译选择的的目的性[J]. 中国翻译, 2002(6): 5.
- [9] 苏超, 朱乐红.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的

影响[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0(5): 87-89.

- [10] 胡适. 1918.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C]//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1]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2]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13] 胡适. 1923.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C]//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3).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4] 胡适. 1917. 文学改良刍议[C]//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5] 许钧. 论翻译之选择[J]. 外国语, 2002(1).
- [16]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7] 廖七一.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 北京: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8] 房列曙, 木华. 中国文化史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19]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5): 16-23.
- [20] 陈海萍, 胡东平. 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8(3): 87-89.

责任编辑: 黄燕妮